DOI:10.16486/j.cnki.62-1035/d.1991.01.004

●余太山

大宛和康居综考

一

大宛的位置，历来虽有若干异说，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在今费尔干纳(Farghāna)。①今案：此说可信。盖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大宛位于乌孙西南、康居东南、大夏（大月氏）东北、捐毒与休循西北。而乌孙在伊犁河、楚河流域，②康居在锡尔河、塔拉斯河流域，③大夏（大月氏）在吐火罗斯坦，④捐毒与休循分别在Kizil su河源头和Alai高原，⑤可断大宛的统治中心确为费尔干纳盆地。不仅如此，大宛疆域的四至也可大致

①最早指出大宛位于费尔干纳的是Deguiignes, Histoire ge'ue'rale des Huns, des Turcs,des Mogols et des autres Tatars occidentaux, I, paris, 1756; 以后A, Remusat, Nouveauxme lange asiatiques I, Paris, 1829; F, Richthofen, Chlna, I, Berlin, 1877等均主此说，唯考证皆欠精审，如F·Richthofen以为休循占有费尔干纳东部，大宛则在西部·白乌库吉曾指出其致误原因，说见白乌氏《大宛国考》，载《西城史研究》上（昭16）。诸异说可参看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下，中华书局，1981，P281～307。岑氏并没有提到的主要有以下两说：（1）简井满志《对大宛学说的质疑》“史渊”58（昭28）指大宛为Badakshan；（2）B·G·Pnlleyblank, Chinese and Indo Enrepeans,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6 认为：张骞首次西使途径的大宛和《汉书·西域传》所载大宛并非一地，后者指Sogdiana。今案：这一结论是说者将《史记》、《汉书》有关记载作了机械对此而得出的，似不足取。又，以此为出发点，说者因指宛都“贵山城”为贵霜匿，指“式师城”为Nesef；均误。

②见拙作《乌孙考》，“西北史地”1988，I。

③见本文第十一节。

④见拙作《大夏和大月氏综考》，“中亚学刊”第三辑。

⑤见本文第十节。

判定。

1、《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西与大宛〔相接〕。"又,同书"陈汤传"载，匈奴郅支单于西奔康居，"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歐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千里。"知乌孙王治赤谷城（在纳伦河上游）至其西境纳有千里。由此可见，乌孙与大宛应以Kagar山脉和yassi山脉为天然界限。

2、《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国……北与康居〔接〕"。康居的本土在锡尔河北，其东境应在塔拉斯河以东，故两国似以Chatkl-tau和Urtak-tau为天然界限。

3、《汉书·西域传》："大宛国……南与大月氏接。"时大月氏已占领大夏地，其东部领土包括Badakhshan和Wakhān等地，故两国似应以Alai高原西部Karategin为接触点①。

4、《汉书·西域传》载："休循国……〔东〕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又载："捐毒国……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知自捐毒赴大宛乃穿越Terek山隘，而非经由休循、穿越Talduk山隘，故大宛似分别以Terek山隘和Talduk山隘与捐毒和休循为界②。

5、大宛的西界，《史记》、《汉书》无据可徵。然据《通典·边防九》："石国……都柘折城（Chaj，Tashkend），方千余里，本汉大宛北鄙之地。"以及《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所载："率都沙那国亦名苏对沙那国（Sutrushana，Ura-tune），本汉大宛国。"则似乎可以认为自Tashkend至Ura-tube一带曾在大宛势力范围之内③。

二

"大宛"一名的语源，历来众说纷纭，但多不得要领，盖论者仅凭对音立说。虽亦有试

①大宛与乌孙、康居、大月氏的界限参见白鸟库吉第17页注（1）所引文。

②参见白鸟库吉第17页注①所引文和本文第十节。

③参见内田吟风《关于月氏迁移的地理年代考证》下，"东洋史研究"3—5（昭13）。白鸟库吉第17页注①所引文，以及《西域史新研究·康居考》（载注第17页注①所引书）以为：当时Sogdiana应属康居，而自康居本土即锡尔河北岸至Sogdiana必须自Tashkend南行，渡锡尔河抵Khojend，复沿Turkestan山脉北麓西行，经NauUra-tübe，Zamin至Jizak，故自Tashkend至Ura-tube一带均不可能是大宛领土。今案：其说未安，详本文第三节。又，《新唐书·西域传》在指出石国为"汉大宛北鄙"的同时，又说其王治柘折城系"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知其地在汉代分属大宛、康居。参见内田氏上引文。又，白鸟氏上引文以为，唐代在宁远置休循都督府表明唐人以为汉代休循在费尔干纳，因而置大宛国于Tashkend和Ura-tude。今案：其说亦未安。唐人于宁远置休循都督府，并不等于唐人认为汉代休循在费尔干纳；而称Ura-tube为"汉大宛国，"称石国为"汉大宛北鄙"亦不等于唐人认为汉代大宛国仅包括Tashkend南部和Uratube之地。

图从历史背景给予说明者，然证据均嫌不足。①还应该指出的是，论者在对音时，往往总考虑"宛"字，而无视"大"字。这显然是因为《汉书·西域传》另有"小宛"一名，以为"大宛"乃相对于"小宛"而言，犹如"大月氏"乃相对于"小月氏"而言，"大"皆系大小之大。②其实这也是错误的。盖据《汉书·西域传》：

> 小宛国，王治扜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户百五十，口千五十，胜兵二百人。辅国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道。

所谓"小宛国"人口不过千余人，位于婼羌之西，又"辟南不当道"，故张骞首次西使虽取南道归国，未必得闻其名；此国为汉人所知，当在汉与西城交往日益频繁之后。而据《史记·大宛列传》，"大宛之迹，见自张骞"，知"大宛"一名之传入，始于张骞西使；也就是说，颇难认为张骞起名之时，已有意和"小宛"相对。要之，"大宛"应该和"大夏"一样，两字均系音译。

有鉴于此，"大宛"（dat-iuan）最可能是Taxuār（Tochari）的音译。③盖Tochar与Asii，Gasiani，Sacarauli等组成的Saka部落联盟很早就居住在东起伊犁河、西抵锡尔河的广大地区。前177/176年，由于受西徙大月氏人的冲击，他们放弃了伊犁河、楚河流域，一部份自该处南下帕米尔。约前104年左右，又有一部分渡锡尔河南下，进入Sogdiana和Bactria。主要位于锡尔河南岸的费尔干纳盆地，在Asii，Tochari等部这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中，被这些移民占领是势在必然。从此，正如Bactria被称为"大夏"一样样Farghana便被称为"大宛"；两者均是Tochari的异译。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和大夏翎侯"贵霜"一样，均得名于四部之一的Gasiani。大宛国东边属邑"郁成"则很可能得名于Asii。④至于小宛，则很可能是后来发现该处居民与大宛有某种渊源（小宛居民有可能是从帕米尔东进塔里木盆地的Tochari人），既有"大宛"命名于前，称之为"小宛"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三

大宛王治贵山城的地望，主要有五说：1、Kokand说；⑤ 2、Ura tube说；⑥ 3、

---

①白鸟库吉对他以前诸说均有批判，见第17页注①所引文。白鸟氏本人以为，Farghāna居民是托勒密《地理志》所载Tapurei人（VI，14），其名在波斯语中讹为Tawar，"大宛"即其对音。今案：Tapurei应为Tagurei之讹，其人居于伊赛克湖附近；参见W·W·Tarn，The G.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P·516—517。我认为Tagurei是留在塞地的Tochari人（参见第17页注①所引拙作），白鸟氏说未安。又，小川琢治《北支那之先秦蕃族》（载《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昭14）以为大宛即《山海经·海外西经》的"大运"，《穆天子传》卷三的"真山"。正如岑仲勉所指：古史荒远，殊非数言而决。岑氏本人则以"大宛"为Andijan之对译，据云Andijan最为富绕，商贾云集，乃至费尔干纳商人被统称为Andijani，"大宛"字发音又与an相近。（出处见第1页注①）今案：岑氏说亦误。

②岑仲勉（出处见第17页注①）等持此说。

③见F、G、PulleYblank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④同注第17页④。

⑤那珂通世《唐代西域图》（未定稿），见桑原隲藏《论大宛国贵山城》，载《东西交通史论丛》（昭19）。

⑥FRichthqfen第17页注①所引书P451。

Akhsikath说①；4、Kāsān说；②5、Khojend说。③迄今前三说已无人信从，④后二说尚未分高低。今案：Khojend说较Kāsān说为胜。

1、《史记·大宛列传》载："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这距离与乌孙王治赤谷城至Khojend的距离大致相符。⑤

2、《史记·大宛列传》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这距离与大夏国都蓝市城（Bactra）至Khojend的距离大致相符。⑥

3、《汉书·西域传》载："休循国……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又载："捐毒国……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这两个距离分别与Alai高原和Kizil su河上游至Khojend的距离大致相符。⑦

4、《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欲何之？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

---

①A·Wylie, Note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Journad of the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881, P, 451。

②T·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on, london, 1894, PP、20—225；藤田丰八《大宛贵山城与月氏王庭》（载《东西交涉史之研究·西域篇》，昭18）；以及内田吟风第18页注③所引文等。

③A·V·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und seiner Nachbarlander von Alexander dem Grossen bis zum Untegang des Arsacidan, Tubingin, 1888, P, 68；三宅米吉《古代欧亚大陆交通考》"地理与历史"—4（明33）；白鸟氏一度亦主此说（见《乌孙考》载第1页注①所引书），但后来转而支持Kasan说。对此说进行全面论证的是桑原氏，见19页注⑤所引文，以及《再论大宛国贵山城》、《读藤田君"贵山城及监氏城"》（均载19页注⑤所引书）。

④对三说之批判，可参看注19页注⑤、本页注③所引桑原氏文。

⑤桑原氏19页注⑤本页注③所引文指出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自凌山经大清池、素叶水城至赭时，约二千一百余里；其中凌山至大清池为四百余里，而赤谷城位于其中途，故自赤谷城至赭时约一千九百里；又据《新唐书·西域传》，赭时至俱战提（Khojend）为二百里（二或系三之误），故赤谷城抵Khojend约二千一百里（或二千二百里）。汉唐一里的长度略同，约400米。藤田氏本页注②所引文指出：自赤谷城（纳伦河上游）主贵山城（Kāsān）应越过拨达岭，到Kala河即今Narynsk处，由此沿纳伦河西行，越Farghāna Kette到Andijan, Namangan，再北上Kāsān。桑原氏则以为：此道应辟于陈汤征郅支之后，前此并非普通的孔道，且即使沿藤田氏所说道路西行，自赤谷城至Khojend实测约770—780公里，合汉里1，950里，而自赤谷城至Kāsān仅1，540—1，550里。又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以为赤谷城位于Nari kol，故其西南二千里的贵山城应为Kāsān。今案：内田氏说未安，说见第17页注②所引拙文。

⑥桑原氏第19页注⑥、本页注③所引文指出：自Khojend经Samarkand至Balkh实测距离为580公里，相当于二千汉里弱。若结合阿拉伯地理著作和唐代记录推算，也可得出大致相仿的结果。他还指出：《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去大宛"可万里"、去大夏"万二千里"，可以参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以为：《史记》所载大夏至大宛距离不足为据，同传称在妫水北的大月氏去大宛二三千里，可证。今案：其说未安。不能因为大宛至大月氏距离有误，便否定大宛去大夏距离。

⑦桑原氏第19页注⑤、本页注③所引文以为捐毒和休循分别在Irkeshtam和Dsipptik，并指出两地去Khojend的距离，按今天的实测图换算，误差不超过40汉里，若指贵山城为Kāsān，则误差在300汉里左右。藤田氏本页注②所引文以为休循在Gulcha；桑原氏指出：Gulcha去Kasan的里程合汉里不过530里，故其说不可从。又，内田氏第3页注①所引文亦主贵山即Kasan说，故指责桑原氏云：休循、捐毒去Kasan多为崎岖山路，故实际里程应大于平面距离。今案：内田氏说果然，不过说明《汉书》有关休循、捐毒去贵山里程的记载无妨贵山即Kāsān说成立，未能据以否定贵山即Khojend说。

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汉书·张骞传》所载略同。知张骞当日所至，应是大宛王治即贵山城。而张骞被拘留十余岁，终于得脱，觅途往赴当时已迁往妫水流域之大月氏，并无必要专程访问大宛国王治，故抵达贵山城定系顺道，Khojend正是必由之途。

以下是几点补充说明：

1．《史记·大宛列传》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而《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国……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知康居王治在贵山城西北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主贵山即Kāsān说者以为，Kāsān西北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应为Chemkent至Turkestan一带，康居王治置于该处极为适宜；若贵山为Khojend，则应求康居王治于Kizil Kum沙漠之中。①今案：其说未安。所谓"西北"，未必正西北。Chemkent至Turkesfan一带也可以说在Khojend西北一千五百里至二千里；故《史记》、《汉书》关于康居王治去大宛王治里距的记载无妨贵山城即Khojend说成立。

2．《史记·大宛列传》载：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贰师〕乃先至宛，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②《汉书·李广利传》所载略同。主贵山即Kāsān说者以为，Khojend位于锡尔河畔，既面临如许大河，固无法"决其水源”，以忧困之；而Kāsān仅一同名小河流径其旁，所谓"徙其城下水”始能行之有效。③今案：此说未安。"皆汲城外流水”者，未必居民直接至城外汲水，极可能是从引入城外流水的沟渠中汲水，所决移之水源应是沟渠之水。类似的形势在中亚不止一处，④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⑤所载亚历山大围攻Cyropolis城的情况可资参照：

> 亚历山大忽然亲眼发现引河水入城的渠道。因为当时正值冬天枯水季节，渠里的水很浅。入城处，水面并未挨着上面的城墙，而是有相当宽的空隙，足以容得下士兵从渠道钻入城内。于是他就带着近卫队、持盾牌的卫兵、弓箭手和阿格瑞安部队，趁守敌忙于对付攻城部队和擂石器之际，亲自带头从渠道钻进城里去。起初只带了几个人进去。进去之后，立即从里边把城墙那一面的几个门都打开，很容易地把其余部队接应进去。（IV⁻，3）

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亚历山大是趁冬季水浅之便，利用引水入城的渠道攻城，李广利是决移这类渠道的水源，造成城中缺水，以利围困。要之，不能因为Khojend面临锡尔河而认为李广利不能断其水源，并断贵山城非Khojend。

3．主贵山即Kāsān说者还有一条理由；当时Sogdiana应属康居，而自康居本土至

---

①见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

②"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汉书·李广利传》作"以穴其城。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以后者为是，盖水源既已决移，引水入城之沟渠自成空穴。岑仲勉以为当从《史记》，意为"尽徙去其城外之水，使城中日渐空虚也”。（出处见第17页注①）今案：岑氏说是。下文"宛固已忧困”，似可为证。

③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又，桑原氏第19页注⑤、第20页注③所引文指出，锡尔河水浑浊，不堪饮用，居民从其支流汲水，故李广利得以断其水源。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则以为，即使水浊，战时未必不用。今案两说皆未安。

④参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⑤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引自李活汉译本，商务，1985。

Sogdiana势必经过Khojend。这种形势说明自Tashkend至Zamin一带，包括Khojend在内应该是康居所领；即使Khojend一地为大宛所有，由于曝露于康居侵寇之前，大宛设都城于该处也不堪设想。① 今案：此说也不妥。一则，自Tashend（至少其南部）至Ura-tube一带应是大宛的领土。二则，Sogdiana不过是役属于康居，不等于化为康居的领土，"役属"的主要内容是贡献方物。因此，两者土地不相邻接无妨于保持这种关系。三则，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康居"兵强"，而大宛"兵弱"，大宛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康居的属国。李广利围困贵山城，康居遣军援救；郁成王逃亡也往奔康居等情况也表明两国关系至为密切，故康居假途大宛或经由其东部边境前去Sogdiana当无障碍。

4.《隋书·西域传》："钹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成方四里。……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钹汗即Farghāna。主贵山即kāsān说者以为，按之该国都城去苏对沙那和石国之里距，知此城应为Kāsān；称钹汗为"古渠搜国"，显然是因为"渠搜"与Kāsān音近。②今案：此说果然，不过证明隋代钹汗国都于Kāsān，未必汉代大宛国亦都于该处。何况，"渠搜"与Khojend读音也相去不远。很可能"古渠搜国"乃指以Khojend为都城的大宛国钹汗与大宛均在Farghāna，不过都城不同。

5.《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国……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又载休循去大宛和大月氏分别为九百二十里和千六百一十里，后者恰为前二者之和。主贵山即Khojend说者或据此以为，自休循赴大月氏乃经由大宛都城，时大月氏都城在Samarkand，去Khojend约七百里，Khojend又正在自Alai高原赴Samarkand的必由之途上。可证贵山即Khojend。③今案其说非是。主要问题在于《汉书》所载大月氏的都城并非Samarkand，而是Bactra；自Alai高原赴Bactra未必经由Khojend，例如沿Surkh-āb河西南行，经Karategin亦可抵达。④故很可能上述千六百一十里乃指休循直接去大月氏的距离，《汉书》编者却误以为是从休循经贵山城前往Bactra的距离，遂据以推算出自贵山城至大月氏都城的距离为六百九十里。⑤要之，《汉书·西域传》关于大宛去大月氏的里距有误，不能作为贵山即Khojend的证据。

6.主贵山即Khojend说者以为，"贵山"虽可视作Kāsān的对音，但不如对Khojend

---

①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②见白鸟氏第20页注③所引文；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的Kasava"氍毹"考—兼论"渠搜"古地名》（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以及第17页注④所引拙文。

③说见桑原氏第19页注⑤、第20页注④所引文。桑原氏又指出，月氏去都护治所4、740里，大宛去都护治所4，031里，两者之差为709里，以证大宛去月氏690里的记载可信。对此，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指出：大宛属北道，月氏属南道，故两者去乌垒里数之差不能代表月氏去大宛的距离。桑原氏驳斥说，自乌垒至月氏应取北道，而非南道。若取南道必经莎车，而据载，乌垒至莎车4，746里，反较乌垒至月氏为远，知自乌垒去大月氏不取南道。今案：两说均未安。自乌垒去大月氏虽如桑原氏说乃取北道，但似乎并不经由大宛前往，而是由休循直接前往。月氏去都护治所的里距（4，740里）和休循去都护治所的里距（1，610里）约略相等，或非偶然。

④参见白鸟库吉《关于葱岭通道》，载《西域史研究》下（昭19）。

⑤"六百九十里"，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和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分前认为系"一千六百九十里"和"二千六百九十里"之夺误。今案：两说均未安。

（Khujond）贴切。①今案：Khojend，Kōsōn可能均得名于Gasiani，故不能仅凭对音.判断贵山是Khojend还是Kōsōn。

7．Khojend一说即阿喀美尼朝波斯居鲁士二世（CyrusⅡ，前558—529年）所建Cyropolis城，一说即马其顿亚历山大（前336～323年）所建Alexandria Eschata。主贵山即Khojend说者以为，不管怎样，该城在前二世纪以前已经存在似可无疑。而当时Kōsōn是否已经建成则无法肯定。②今案：原居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塞人部落（Gasiani即其中之一最早可能在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前521—486年）即位之前，已伸张其势力于锡尔河北岸；③因此，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Kōsōn由于Gasiani得名早于Khojend。

四

贰师城的地望，历来主要有四说：1．Uratube说；④2．Margilan说⑤3．Kōsōn说；4、Jizak说。⑥今案：第一说近是。

1．《史记·大宛列传》："贰师马，宛宝马也"。《汉书·李广利传》同。"贰师马"（Nesaeanhorse），古良马名，首见于希罗多德《历史》，⑦据载，原产Media"一个称为Nesaean的大平原。"（VⅡ，40）按之西史，在阿姆河南北，自Media西南，经呼罗珊至费尔干纳，均有以Nisa，Nisaya命名的地方，且多为良马产地。⑧由此可见，"贰师〔njiei-shei〕城"亦得名于Nesaean马之一地。

2．《史记·大宛列传》载："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汉书·李广利传》同。可知李广利西征的目的地是贰师城，但传文以下仅载李广利郁成及宛都之战，并无只字提到贰师城⑨这可能是因为贰师城在宛都之西，不破宛都则不能至贰师城。且李广利西征，目的虽然不全

---

①见桑原氏第17页注⑤、第18页注③所引文。

②见桑原氏第17页注⑤、第18页注③所引文。

③参见拙作《塞种和罽宾综考》，"中亚学刊"第四辑。

④主此说者有E·Chavannes·Leo meʼ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vol、I、Paris，1895，P、75，note I·Trois geʼnneraux Chinois de la dynastie des Han orientaux，Toung Pao 7（1906），P、253，note 2；W·W·Tarn第19页注所①引书P、309，以及桑原氏第19页注⑤所引文，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等。

⑤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据云，李广利所攻宛都应为弍师城，该城去郁成（Ush）二百里，其地即今Margilan，当时或因饲养Nesaean马而得名"弍师城"。桑原氏第20页注③所引文、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岑仲勉（出处同第17页注①）等对此均有批判，可参看。

⑥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据称，李广利所攻宛都应为弍师城，故弍师即贵山。Kasan之北有地名Gidghil，应即时"弍师"之对译。今案：其说非是。桑原氏第20页注③所引文对此亦有批判，可参看。

⑦岑仲勉说（出处同第17页注①）。据称，Jizak即"弍师"之对译。其地在Turkestan山脉北麓，水草不恶，又僻处西南，故汉师不到。今案：其说未安。盖大宛西境抵达Jizak未能证明。

⑧希罗多德《历史》，引自王以铸汉译本，商务，1985。

⑨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⑩参看岑仲勉书（出处同第17页注①）。

在贰师城善马，而如果式师城在宛都之东，“贰师将军”全然置之不顾，于理未安。另一方面，宛都既破，贰师马已获，虽然再往贰师也就没有必要了。①

3．《史记·大宛列传》又载：“贰师将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汉书·李广利传》同。结合上引期至贰师城取善马”云云来看，似乎李广利“期至”的贰师城便是宛都。同传所载宛都破后，“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云云，仿佛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或指贰师即贵山城，②或以为宛初都贰师，③后迁至贵山。今案：两说均欠妥。一则，《汉书·西域传》明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又未尝提及迁都，故李广利所破宛都应为贵山城无疑。二则，《史记·大宛列传》载：“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率多进孰于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汉书·李广利传》略同。当时宛都果即贰师城，前面既已点明，“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后面只须说“以请宛王善马”，语意已臻完足，不然则有累赘之嫌。三则，“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句，可以这样理解，李广利的目标依次为郁成、王都（贵山）和贰师城，郁成不举，王都且不能至，更何论式师城。

4．《新唐书·西域传》载：“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对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知唐人以为贰师城在Ura-tube一带。Ura-tube位于宛都贵山城（Khojend）西，故汉兵未能到达，当时该地可能因牧养Nesaean马而得名“贰师”。唐人所言，或有所据。

五

郁成的地望，历来主要有三说。1．Ush说④ 2．Uzgent；⑤ 3．Aksikath说。⑥今案：第三说非是，前两说优劣难判。

1．“郁成”一名，既可能是Ush，又可能是Uz〔gent〕的音译。

---

①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以为：汉军入宛，宛属邑（式师城即其中之一）集中其人畜于王都以避兵锋，故李广利破王都而得善马又，李广利进军的目的并非式师城，而是宛都；以正宛王斩汉使之罪。今案：此说未必然，盖式师在宛都之西，似无必要驱人畜至宛都，宛都自有善马，亦不足为奇。又，李广利官号“式师”，式师城自然成为进军的目的地之一。唯宛都不破，不得至耳。

②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

③白乌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又，岑氏以为宛都初在安集延，后迁至贵山即Tāsān（出处同第17页注①）。今案：岑氏说亦欠妥。

④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⑤岑仲勉说（出处同第17页注①）。又，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以为郁成应为Terek或Uzgent。

⑥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据云，按之阿拉伯人的记载，Kāsān东部最大的城市为Aksikath，而Ush，Uzgent等在汉代是否已经存在，不得而知。今案：Aksikath在汉代是否已经存在，同样不得而知。

2．《史记·大宛列传》载，武帝遣使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王不肯予，“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汉书·李广利传》同。知郁成位于大宛国即费尔干纳盆地的东边。Ush，Uzgent均符合条件。

3．《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初征，因攻郁成不克，反为所败，未能至宛都。同传又载：李广利再次西征时，“欲行攻郁成”，因“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然其校尉王申生等又“别到郁成”。结合前引请马汉使于归途被郁城遮杀的记载，可知郁成虽非赴宛都所必由，但经郁成前往应是当时正道。只是无从知道这条路究竟通过Uzgent，还是通过Ush，换言之，根据现存资料，无法判断何者处在赴宛都（Khojend）途中的可能性较大。

4．《史记·大宛列传》载：“初，贰师起敦煌西，以为人多，道上国不能食，乃分为数军，从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胪壶充国等千余人，别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负而轻之，责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窥知申生军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军破，数人脱亡，走贰师，贰师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闻汉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骑士缚守诣大将军。”《汉书·李广利传》同。据此，论者或以为申生等后至，其军“别到郁成”时，李广利围攻宛都的战斗已经开始。所谓“王申生去大军二百里”，亦即郁成至宛都的距离，并进而判定两者的位置。①今案：此说未安。李广利再次征宛，分为数军，申生等很可能是其中一军，因后发，而与广利大军相去二百里。质言之，申生等抵郁成时，广利尚在赴宛都途中，不能认为郁成去宛都仅二百里。

六

李广利初征大宛，据《汉书·武帝纪》，在太初元年（前104年）秋。败归，《资治通鉴·汉纪》系于太初二年，列在“秋蝗”后，“冬十二月，倪宽卒”之前，故当在是年秋。又据《汉书·李广利传》：“……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扞寇盗，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知李广利自二年秋，经“岁余”而再出敦煌，时当为三年秋。破宛得马，《通鉴》系于太初三年；又据《汉书·武帝纪》：“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之歌。”汉天子作歌当在李广利班师之后，故城下之盟当在三年冬。②冬季水浅，贰师令水工徙其城下水，可谓得天时。

李广利第二次西征所从“南北道，”历来有二说。一说即《汉书·西域传》序所载西域南北道：③

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　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

---

①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以及岑氏（出处同第17页注①）均以为李广利所攻宛都去郁成二百里，故分别判断两地为Margilan和Ush，Kāsān和Aksikath，Andijan和Uzgent。

②参看冯沅君《读（宝马）》，1937年5月16日上海大公报，“文艺”336期

③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随廷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一说李广利取道应与后来陈汤伐郅支相同。①盖据《汉书·陈汤传》：

其三校从南道踰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

李广利所从南道与陈汤等所从南道同，应即《汉书·西域传》的北道；李广利所从北道，略同陈汤等所从北道，乃度拔达岭，沿纳伦河西行赴宛都。《汉书·李广利传》有载：

宛国绕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有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

李广利分军旨在求食，故不可能取西域南道。而同传所载武帝诏：

贰师将军广利征讨厥罪，伐胜大宛。赖天之灵，从泝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积，士大夫径度，获王首虏，珍怪之物毕陈于阙。

其中"西海"应即阗池，亦可为证。今案：后说未安。

1．西域南道乏食与水草或为实情，但未必军不能通行。据《汉书·西域传》，李广利班师，走的正是西域南道：

初，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还过扜弥，扜弥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广利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即将赖丹入至京师。

所谓"广利责龟兹"，当是遣使相责。何况果如宛贵人所谋，北有胡寇，南道难行，岂非伐宛之举完全不能实现？

2．武帝诏所谓"西海"，亦见於同书"西域传"："条支国临西海"。《史记·大宛列传》同。应指地中海，乃当时汉人所知西域之极界②。通西海"等于说通西域。若西海指阗池，则"通西海"毫无意义。《汉书·礼乐志》载太初四年诛宛王获宛马所作"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其中"西极"义同"西海"；可参证。

3．《汉书·李广利传》载："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击宛。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所从"北道"果与陈汤同，则必经由乌孙王治，乌孙何敢持两端，逡巡不前？

要之，李广利再征大宛，乃取《汉书·西域传》所载"南北道"。同书"李广利传"载"於是贰师后复行，兵多，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轮台，轮台不下，攻数日，屠之。"或者进军时，李广利亲率大军走北道。又，还军时，李广利乃亲率大军走南道，当亦分军走北道。

七

汉伐大宛，起因於武帝"好宛马"，《史记·大宛列传》载：

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公主，为

---

①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

②参看拙作《条支、黎轩、大秦和有关的西域地理》，"中国史研究"1985，Ⅱ。

昆弟。……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

导火线是求贰师马不得，使者被杀。同传又载，武帝闻使者进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予汉使，乃遣使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贵人不肯予，且下令“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盖如《汉书·苏武传》所谓“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使诛灭”。显然在武帝看来耻莫过于斯，是无法片刻容忍的。

然而，应该看到，伐宛事件暴发的根本原因在於当时大宛已成为汉王朝西域经营的巨大障碍。据《史记·大宛列传》，汉自元封元年（前110年）虏楼兰王，击破姑师以后，虽已列亭障至玉门，但“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姿晏然，未诎可以礼羁縻而使也。”这和武帝原来的企图大相逕庭。同传载，早在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时：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偏于四海。

而武帝用兵楼兰、姑师，本来也有“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的打算，但结果未能奏效大宛并不就范。更有甚者，据《汉书·李广利传》：

危须以西及大宛皆合约杀期门车令，中朗将朝，及身毒国使，隔东西道。

可知车令被杀并不完全是由于他“妄言”的结果，大宛与危须以西诸国合约隔东西道可能是主要原因。因此，武帝伐宛，是势在必行。

总之，大宛不附，不仅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言：“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东西道被隔，国威扫地；而且由于西域经营将不得不中止，匈奴右臂无从切断。因此，同传记载，李广利初征败归，“天子闻之大怒，而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且“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不惜“天下骚动，”再次大举伐宛，显然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而当贰师班师归来，“天子为万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候”。其余论功行赏，规模空前。

论者或以为伐宛一役是由于武帝“好宛马”，并进而探索其动机，有改良马政，乘天马升天诸说，争论由来已久。①我认为，无论武帝出於什么动机而“好宛马”，“好宛马”以及由此导致的汉使臣被杀事件不过是伐宛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设宛无贰师马，只要它严重妨碍武帝的西域经营，同样可能遭伐。盖西域经营，犹如征朝鲜、平两越、通西南夷一样，都是武帝为实现其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而必然采取的步骤。宛有善马，不过适逢其会，使伐宛在表面上不同於征朝平越而已。

伐宛的功过得失，历来评价不一。《汉书·陈汤传》载刘向之言曰：

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厪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

---

①余嘉锡《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辅仁学志”，9～1，1940；张维华《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中国文化研究汇刊”，3，1943；邢义田《汉武帝伐大宛原因之再检讨》，“食货”（复刊），2～9，1972，及其《补白》，“史绎”10，1973；A、Waley，Heavenly Horses of Ferghana：A New View，History Today，V，1955等等。

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録其过，遂封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余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於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

借李广利陪衬陈汤，等于指责武帝伐宛得不偿失、功不抵过。他的看法很有代表性。

伐宛战争，耗费巨大，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汉书·五行志》），以致"海内虚耗（《汉书·西域传》），加剧了由于元狩、元鼎以来开边、兴利引起的政局动荡，自不容讳言。然而其积极的一面也应该看到。据《史记·大宛列传》，"贰师将军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又载："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可知伐宛的胜利，造成了西域"外国皆臣属于汉"（《汉书·西域传》）的局面。《汉书·西域传》在总结武帝的西域经营时指出：

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

所谓"使者校尉"，无疑就是后来西域都护的雏型。可以说，由于大宛臣服，汉在西域的威望大大提高，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得到了有力保障，西域和中原的联系正式建立，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从此跨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在今天，我们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时，对伐宛的意义，还是应该充分估计的。

八

王莽时，西域怨叛，役属於匈奴。据《后汉书·西域传》："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会匈奴衰弱，莎车王贤诛灭诸国"，西域一度处于莎车的控制之下，大宛亦曾役属之。据同传：

贤以大宛贡税减少，自将诸国兵数万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贤因将还国，徙拘弥王桥塞提为大宛王。而康居数攻之，桥塞提在国岁余，亡归，贤复以为拘弥王，而遣延留还大宛，使贡献如常。

这种情况，大概继续到莎车王贤去世。同传载，西域诸国在"贤死之后，遂更相攻伐。"其间大宛的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同传又载：明帝"永平中，北虏乃胁诸国共寇河西郡县，城门昼闭。十六年（73年），明帝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明年，始置都护、戊己校尉"。西域复通之后，大宛与东汉的交往，明确的记载只有《后汉书·顺帝纪》一条："〔永建〕五年（130年）……大宛、莎车皆奉使贡献。"史籍记事容有疏漏，但徵之《后汉书·西域传》：

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顺帝永建二年，勇复击降焉耆，於是龟兹、于窴莎车等十七国皆来服从，而乌孙、葱岭以西遂绝。

则至少班勇以后，大宛正式遣使东汉，永建五年是唯一的一次，也不是不可能的。

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东汉一代，大宛来朝见于记载的仅有一次，但大宛的特产汗血马，却屡见传入。例如，《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

〔建初〕三年（78年），〔帝〕特赐苍及琅琊王京书曰："……并遣宛马一匹，血从前髆上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霑赤汗，今亲见其然也。"

又同书"李恂传"：

后复徵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

又同书"段熲传"：

〔建宁〕三年（170年）春，徵还京师，将秦胡步骑五万余人，及汗血千里马，生口万余人。

又同书"梁冀传"述冀穷极豪侈，"远致汗血名马"。又同书"班固传"载《两都赋》亦提到"大宛之马"。可知当时大宛地区和中国内地交往的渠道还是通畅的。

九

《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贾，争分铢"。《汉书·西域传》同。可知大宛人的族属和安息相同或接近，皆系亚利安人。又如前述，大宛"应该是Tochari之对译，大宛人可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的塞人。因此，大宛人所说的语言应该和大夏人一样，都属於印欧语系，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居民的原始语言是吐火罗语。①《史记·大宛列传》载：

大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耆酒，马耆目宿。

或以为"蒲陶"、"目宿"相当于伊朗语的budāwa和buksuk；②果然，可以作为大宛人和安息人"相知言"的证据。

有人以为《史记·大宛列传》载李广利曾"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其名可用突厥语解释特别是末字"靡"，应即突厥语bag，bi之音译并由此推论当时大宛国上层统治者（君主和贵族）应为突厥语族③。今案：此说未安。一则，"靡"等也可以用印欧语诠释④；二则，不能排除后世突厥语的某些词汇，尤其是官号，得自上古印欧语系诸族的可能性。

十

帕米尔地区由塞人建立的国家，《汉书·西域传》明确记载的有捐毒和休循。这两国的地望与以上所考大宛国的不少问题关系密切，故附考於此。

①同第17页注④。

②劳费尔《中国伊朗编》，林筠因汉译本，商务，1964，PP、31～70。

③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④E·G·Pulleyblank,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Asia Majo· 9,1962以及第17页注①所引文。

《汉书·西域传》载："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去长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户三百八十，口千一百，胜兵五百人。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岭，则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捐毒的地望历来有种种异说，①但自从有学者指出应在Irkeshtam以后，②渐为多数人接受，只有个别人不以为然，指捐毒为身毒。③我认为，Irkeshtam说是可取的。理由如下：

1．《水经注·河水二》："河水重源有三，非为二也。一源出身毒之国，葱岭之上，西去休循二百余里，皆故塞种也，南属葱岭，高千里。……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水西迳休循国南，在葱岭西。"持前说者认为，此处"身毒"应为"捐毒"之误。河水三源乃指于阗河与葱岭南北二河，发自捐毒者应是葱岭北河即Kashghar河，故捐毒应在该河源头即Kizil Su河流域。持后说者则认为，郦道元首解捐毒为身毒，甚是，河源指新头河源即Hunza河；葱岭指兴都库什山，自此而南便入印度，"捐毒"乃BHindu之音译，位于Taghadum bash附近山谷。今案：此处"身毒"一本迳作"捐毒"④，故未必郦道元解捐毒"为"身毒"。《汉书·西域传》颜注："捐毒即身毒。天笃也，本皆一名，语有轻重耳"。不过说"捐毒"与"身毒"等同一语源，不能据以释地。又，郦注称"河水重源有三"，其二源应即葱岭河与于阗河，第三源乃指自葱岭（Pamur）西流之水⑤既称"重源"，可知在郦道元心目中，三源同在一处，故捐毒所在河源，即使如持后说者所指，系新头河源，其位置也应与葱岭河、于阗河同。

2．《汉书·西域传》载："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结合同传所载捐毒"西北至大宛千三十里"，持前说者指出，捐毒应位于自疏勒赴大宛山道之要冲，即Irkeshtam，经该处越Terek山隘可至费尔干纳。而持后说者断传文"至疏勒南与葱岭属"为"至疏勒南，与葱岭属"；并以为原文应作"北至疏勒"，乃因上文讹"南与乌秅接"为"北与乌孙接"而妄改为"南至疏勒"，又倒作"至疏勒南"。我认为：说者为证成己说，任意变更原文，颇难令人首肯。其实，今传文应以"至疏勒"三字为句。"至"字前因承上"东至都护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而省"东"字，"疏勒"下夺捐毒至疏勒里数，如此而已⑥。

3．传文称捐毒"北与乌孙接"。持后说者以为应改为"南与乌秅接"。盖既指"捐毒"为"身毒"，乌孙远在天山，势不能相接。同传"衣服类乌孙"句，"乌孙"疑亦"乌秅"之误。今案："乌孙传"称"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捐毒本塞种，其人又游牧为生，故衣服相类。而"乌秅传"载其人"山居，田石间"，显然已非行国，衣服安能相类。又如前述，

---

①诸说的概要和批判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和岑氏第17页注①所引书PP、318～322。

②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

③岑仲勉说（出处同本页注①）。

④如柳本《永乐大典》。见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P、29。

⑤参见森鹿三，日比野文夫译注《水经注》，"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1（昭60），P、165。

⑥cf A、E、P、Hulsewe & M、A、N、Io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 the Early State: 125B、C～A、D、23, Ieiden, 1979, P、139, note 360。

乌 孙西境直至Kagart山和yassi山，捐毒系行国，活动范围当不限於Irkeshtam一地，其北境与乌孙接触，亦完全可能。

4．《汉书·西域传》称："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明言捐毒在疏勒西北。持后说者又改"西北"为"西南"；亦误。

5．据颜注，"捐毒"与"身毒"音同，故"捐毒"很可能得名於Hindu；所治"衍敦谷，其名或与"捐毒"同出一源。① 或者捐毒一地的塞种，并非直接自塞地南下，而是先南度兴都库什山，复自身毒北上而至Irkeshtam的。

《汉书·西域传》载："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休循的地望，历来也有种种异说。② 但既考定捐毒在Irkeshtam，休循便应在Alai高原无疑。③

1．"捐毒传"称，自捐毒"西上葱岭即休循也。"又，"休循传"称，休循东"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捐毒既为Irkeshtam，则休循应在Alai高原东部，以Taum Murun山隘与捐毒相接。自休循越过Talduk山隘，西北向经Gulceha可至Farghāna的Ush，沿Surkh-āb河西行，经Karategin可抵Bactra，与本传关于西北至大宛、西至大月氏的记载亦无不合。

2．或以为捐毒应在Irkeshtam，休循应在Gulcha。④ 其说主要立足於断大月氏王庭在Khuttal。今案：此立足点无疑是错误的。何况Gulcha位于Irkeshtam西北，不在其西；且自Irkeshtam赴Farghāna必须经过Gulcha，而按之捐毒、休循彼此的距离，以及两者去大宛的距离，可知自捐毒赴大宛未必经过休循。Gulcha说不可从。⑤

3．或以为捐毒应在兴都库什山以南，故指休循为Hunza，且举"难兜传""北与休循〔接〕"一句为证。⑥ 我认为：位于Alai高原的休循国，仅有"户三百五十八，口千三十"，是一个小国，和位于兴都库什山南的难兜国，确实不可能境界相接，但不能仅仅据此将休循移置兴都库什山以南。上引"罽宾传"明载休循位于疏勒西北。"难兜传"如是说，很可能是因为难兜之北，一度为汉人所知者仅休循一地。⑦ 要之，捐毒既为Irkestam，则休循必非

---

①白鸟氏《塞民族考》（载第17页注①所引书）以为"捐毒"乃突厥语ɑndįį之音译。今案：白鸟氏说非是。又，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以为"衍敦"即Irkeshtam之音译，自Irkeshtam至Gulcha有山隘名Kidshabai，或即"捐毒"之遗名。

②诸说的概要和批判见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和岑氏第17页注①所引书PP、310～316。

③白鸟氏第17页注①所引文。又，松田寿男《伊朗南道论》（载《东西文化交流史》，雄山阁，昭50）说同。前者以为在Disppitik，后者以为在Sari tash。

④藤田氏第20页注②所引文。

⑤参见桑原氏第19页注⑤第20页注③所引文。

⑥岑仲勉说（出处同本页注②）。

⑦参见榎一雄《难兜国考》，载《加藤博士还曆纪念东洋史集说》（昭16）。

Hunza。

4．“休循传”载，休循“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或以为这并不是两者的实际距离，而是《汉书》编者从休循至大月氏的距离（1.610里）中减去大宛至大月氏的距离（920里）而得到的结果。①今案：其说非是。盖自Alai高原（休循）至宛都贵山城（Khojend）的距离和920里正相符合，而“大宛传”和“休循传”载两者东至都护治所的距离分别为4.031里和3.121里，两者之差为910里，亦可见“休循传”所载休循至大宛的距离不误。②又，“休循传”和“大宛传”载两者去长安的距离分别为10.210里和12.550里，两者之差为2.340里；说者又持此证明“休循传”所载休循去大宛距离有误，并指休循为南道之国。今案：此说亦不妥。盖大宛、康居皆由北道往赴，而“大宛传”载大宛“北至康居卑阗城一千五百里”，而“康居传”载康居“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反较大宛去长安距离短250里，知“大宛传”载大宛去长安距离难以凭信。

5．“休循”一名，可能是Gasiani之音译。③Gasiani是前177/176年自伊犁河、楚河流域南下帕米尔的塞人之一部。④

十一

康居的位置，根据《史记》、《汉书》等的记载，可约略考知。⑤

1．《史记·大宛列传》载：康居“与大宛邻国。”《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北与康居接。”大宛位于Farghōna盆地，故两国应以Chatkal-tau和Urtak-tau为天然界限。⑥

2．《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临大泽，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略同。奄蔡当时游牧于咸海、里海以北，所临大泽很可能指咸海，故奄蔡与康居的界限应在锡尔河下游。⑦

3．《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西北与康居〔相接〕。”同书“陈汤传”载，甘延寿、陈汤征匈奴郅支单于时，“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踰葱岭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阗池”即伊塞克湖，乌孙领土在此湖周围，西境以Kagart山和yasji山和大宛为界，故其西北似应以Alexandrovski山脉和楚河与康居为界。⑧

---

①岑仲勉说（出处同第31页②注）。

②松田寿男指出，4，031里应为4，021里之误；说见《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昭45），P、71。

③白鸟氏第31页注①所引文以为“休循”乃突厥语üšün之音译。今案：白鸟氏说未安。

④同第17页注④。

⑤最初西方学者多误以为康居本土在Sogdiana；此说乃基于对《隋书·西域传》等有关“康国”记载的误解。康居于Sogdiana的区别已由白鸟库吉辨明，因此本文对康居即Sogdiana说以及在这一前提下作出的种种考证不再批判。白鸟氏说见第18页注③所引文，以及《粟特国考》（载第22页注④所引书）。

⑥参见白鸟氏本页注⑤所引文以及本文第一节。

⑦参见白鸟氏本页注⑤所引文，以及拙作《奄蔡阿兰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I。

⑧参见白鸟氏本页注⑤所引文，以及第17页注②所引拙作。

4.《汉书·匈奴传》载，郅支杀汉使者，又畏呼韩邪之强，欲远遁，“会康居王数为乌孙所困，与诸翎侯计，以为匈奴大国，乌孙素服属之，今郅支单于困阨在外，可迎置东边，使合兵取乌孙以立之，长无匈奴忧矣。”同书《陈汤传》载，郅支西奔康居后，“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都赖水”即塔拉斯（Tal_as）河，此河流域应即康居王迎置郅支之地。同传又载陈汤之言曰：“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划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伊列”得名于Ili其国应在Ili河下游（其上游和中游当属乌孙）。从郅支欲令康居降服乌孙，然后北击伊列，以及前引同传“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的记述，可知康居的“东边”尚在塔拉斯河以东，应沿伸至楚河。①

5．《魏书·西域传》载：“者舌国，故康居国，在破洛那西北。”《通典·边防典》称，“石国……都柘折城，方千余里，本汉大宛北鄙之地。”“者舌国”应即“石国”，“者舌”即“柘折”之异译。由此可见至少Tashkend北部也曾一度属于康居。②

十二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今案：“卑阗城”下应夺“卑阗城”三字。“马行七日”、“九千一百四里”和“五千五百五十里”应为卑阗城去越匿地、蕃内和都护治所的距离。③

卑阗城，据《汉书·西域传》：“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贵山城”即Khojend，④知康居此城应在Kara-tau以南、锡尔河北岸Turkestan一带。⑤“卑阗”一说系čagatai语之bičin，Osman语之bižan，义为“城”；⑥一说系突厥语batar之转，意指“沼泽之地”。⑦今案：两说之基础在於指康居为突厥语族。然指康居为突厥语族并无充分依据，故两说均未安。“卑阗”的语源尚待今后探究。

乐越匿地或越匿地，为康居王冬所治，故应在卑阗城之南马行七日的距离，或在Tashkend一带（详下）。其名称一说Ottok（鄂托克）之音译；⑧一说原语应为Lux yañad，意为

---

①同第32页注⑧

②参见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

③参见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A、E、P、Hulwe&M、A、N、Loewe第30页注⑥所引书PP、124～125认为：都护去长安为7，238里，卑阗去都护为5，550里，知卑阗去长安应为12，788里；故12，300里应为越匿地去长安的距离今案：此说亦可通。

④见本文第四节。

⑤参见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徐松本页注③所引文以为卑阗得名于阗池，位于池西；丁谦《汉书西域传考证》以为在Talas河上；均未安。参见岑仲勉第17页注①所引书PP、237～265。

⑥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⑦岑氏说（出处同本页注⑤）。

⑧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他以为“乐”，突厥语uLu（ulug）之对音，义为“大”，“乐越匿”即“大鄂托克”。

"芦草丛生之边缘。"。① 今案：两说均未安，理由同上。②

蕃内，这一名称的意义尚无确解。③ 传文称其地去卑阗城"九千一百四里"，数字有误盖据《汉书·西域传》乌孙王治赤谷城"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则蕃内地去都护治所应为六千七百二十一里。此里数减去卑阗城去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得卑阗城去蕃内一千一百七十一里，故传文"九千"或系"一千"之误。④ 又，蕃内地为康居王夏所居，其地应在Turkestan西北一千余里处。

十三

据《史记》、《汉书》等有关记载，可以推知两汉时Sogdiana为康居属土。

1.《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使月氏，经宛都，宛王"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汉书·张骞传》略同。今案：其时月氏王庭在妫水北岸，张骞自宛都（Kk-ojend）往赴，势必沿Turkestan山脉北麓西行，经Samarkand南下，断无必要绕道锡尔河北岸的康居本土。因此，所谓"抵康居"，只能认为是抵达康居的属土Sogdiana。这也表明当时月氏虽置王庭於妫水北岸，其领土则主要在妫水之南即Tukharestan。《史记·大宛列传》称大月氏"北则康居"，所谓"康居"也可以理解为康居的属土Sogdiana。⑥

2.《史记·大宛列传》载，安息国"临妫水"。《汉书·西域传》在载安息国"临妫水"的同时，还载其国"北与康居接"。今案：当时木鹿地区为安息所占，故安息所临妫水应为阿姆河中段，而木鹿地区的对面即Bokhara等绿洲，因此所谓"北与康居接"，也只能理解为安息国与康居的属土Sogdiana相接。

---

①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

②E、G、Pulleyblank第29页注④所引文以为"乐越匿"是yaxartes的另一表现形或。

③A、E、P、Hulswe & M、A、N、Loewe第30页注⑥所引书P、126译"蕃内"为Within the realm，又以为其地或即安息北面的Parni均未安。

④参见王国维《西域杂考》，载《观堂集林·别集一》。岑仲勉以为"九千一百四里"不误，并说："乞儿吉思草原广数千里，乌孙传曰五千里，不过指其东边，本传曰九千里，则穷其西极"。（出处同第33页注⑤）。又，A、E、P、Hulswe & M、A、N、Loewe第30页注⑥所引书P、125以为"九千一百四里"系"九十一里"之讹；盖"十"讹为"千""一里"讹作"百四"，又衍"里"字。今案：两说均欠安。

⑤F、Hirth, Uber wolga-Hunnen und Hiung-nu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c oler wissenschaften, Phil hist, Klasse, 1899, II, P、272以为康居本土包括Sogoliana；非是。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以及岑氏（出处同第33注⑤）均指Sogdiana为康居属土；甚是，又，白鸟氏以为近人指康居其土为Sogdiana是由于《隋书·西域传》误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今案：白鸟氏此说不尽然。

⑥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另参见第17页注①所引拙文。

⑦参见孙毓棠《安息与乌弋山离》，"文史"5。又，《隋书·西域传》称："安国，汉时安息国也。"似乎安息曾一度占领阿姆河右岸的Buhara地区。然而这很可能是因为Sogdeiaua人自称该地为Āu，隋人遂误以为汉时安息国。参见w B、Henning, The Sogdiana Texts in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4，1946。又，《册府元龟》卷五六O载贞元十七年（801年），贾耽上"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曰："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舛谬，悉从厘正"。则唐人已知其误。

3.《汉书·西域传》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并贡献，都护郭舜因上言："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①今案：康居系游牧部族，虽未必不知贾市之利，但致於"遣子入侍，诈称'为好'"，则很可能受其属下Sogdiana人的影响。这与哌哒、突厥占有Sogdiana后的情况颇为类似，似乎也可以说明当时Sogdiana在康居控制之下。②

4.《后汉书·西域传》载，"粟弋国，属康居"。又载："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可知东汉时Sogdina（粟弋）仍为康居属土。

以下是几点补充说明。

1.或以为《史记·大宛列传》明载康居"国小"，似乎不应有如此广大的势力范围。③今案：《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事情於户口胜兵数特详，而於领土范围多语焉不详，知两汉政权重视"民数"甚於田土；因此，所谓国之大小，其实不以地域广狭而以人户多寡为标准。④《史记·大宛列传》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所谓"其旁大国"，当为安息、奄蔡、条支、黎轩、身毒、乌孙，而康居户口数仅略多於乌孙；故称"国小"与其领土及势力范围之大小无涉。同传又称康居"兵强"，Sogdiana受它役使是完全可能的。

2.如前所述，Tashkend南部属大宛，而据《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括地志》所载，"率都沙那国（Sutrushna，Ura-tube）……本汉大宛国。"可知自Tashkend直至Ura-tube皆属汉大宛国。或以为当时自锡尔河北康居本土至Sogdiana必须经由Tashkend，Ura-tube等地，这一带果属大宛，则Sogdiana似不可能受康居控制。⑤今案：Sogdiana役属于康居，并不等於完全化为康居领土，很可能是康居在该处置将监领，甚至不过是Sogdiana向康居表示臣服，岁时进贡而已。再者，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谓，大宛"兵弱"，而康居"兵强"；大宛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康居役属，故康居往赴Sogdiana完全可以假道大宛。且看康居与匈奴之间间隔着伊列、乌孙等国，并没有使康居摆脱"东羁事匈奴"的命运。何况，Ura-tübe至Tashkend一带在汉代未必自始至终属于大宛，其间康居、大宛双方势力消长，因资料缺乏，已不得而知其详。换言之，Tashkend等地既可能分属康居、大宛，也可能先后单属其中一国。总之，理解不能执着。

---

①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并举《诗·卫风》："永以为好也"以证。又，《资治通鉴·汉纪》胡注："谓特欲行贾以市易，其为好辞者诈。"A、B、P、Hulswe & M、A、N、Loewe第30页注⑥所引书P、128从胡说，并举《汉书·匈奴传》："遣使好辞请和亲"，"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以证。又，杨树达《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P、759）："好字去音，当读断。文谓彼欲通市为和好，乃诈辞耳。胡说於文不顺。"今案：杨氏说误；胡注亦欠通。

②参见拙著《哌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PP、107～108，117。

③见桑原隲藏《张骞之远征》，载第19页注⑤所引书。

④岑氏以为《史记》称康居"国小"，是因为张骞未能深悉当时康居领域已包括Sogdiana在内（出处同第33页注⑤）今案：其说未安，张骞固未能深悉康居领土广狭，然亦未必能深悉其余各国版图大小，可见他判断国之大小不以领上为标准又，两汉县乡设置不以地域广狭而以人户多寡为标准，官吏名号秩别也因人户多寡而不同。各郡国之下具列户口细数而无垦田细数，可知古代国家反映当时政治制度的文献亦重视人户的程度过于田土。见王毓铨《"民数"与汉代封建政权》，"中国史研究"，1969，Ⅲ。

⑤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3．《史记·大宛列传》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或以为张骞自大宛赴大月氏如果经过的仅仅是康居的属地，不会留下这样的记载。"兵弱"的大宛畏惧"兵强"的康居，先导送张骞至康居亦在情理之中，而张骞西使大月氏旨在抗击匈奴，如何对待康居，也至关重要，而未必不乐意去其都城。①同传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又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大月氏在大夏之北，去大宛距离反较大夏为远，岂不表明所谓"二三千里"中包含了张骞自大宛至康居王治的里程在内②。今案：所谓"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乃指大宛王治至康居王治的距离，张骞虽未亲至康居王治，但未尝不可得自传闻。张骞既然知道大宛至康居王治的里程，也就不可能将这一段距离包含到大宛王治和大月氏王庭的里程之中去。同传又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显然不能用来证明张骞曾亲赴奄蔡。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的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国中，有关记载以康居为最简，与奄蔡、乌孙同，似乎也说明了张骞并未亲临其王治。又，同传称，"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又称康居"南羁事月氏"，知月氏之兵又强於康居，大宛何独惧康居而不畏月氏，以致必先导送张骞至康居王治。何况康居"东羁事匈奴"，张骞当时脱困不久，赴康居王治谒见其王又复何求？至於传文所载大宛至大月氏"二三千里"，不过是因为大月氏系"行国"、其王行止无定所而云然。果然这一数字表示大宛经康居王治再至大月氏之距离，大月氏又在大夏之北，按照说者的逻辑，岂非大宛至大夏的距离还应该超过"二三千里"。

4．《史记·大宛列传》载，月氏为匈奴所逐远遁，"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或以为既称"西击大夏"，说明其时Sogdiana应在大夏版图之内，大月氏首先占有大宛西方的Sogdiana，然后南下征服大夏全土。又《汉书·西域传》载，大宛国"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说明月氏击破大夏后，设王庭于Samarkand；质言之，Sogdiana应属月氏而不属康居。③今案：前文所述Sogdaana役属康居，乃张骞西使当时及其以后的情况，在此之前不得而知。即使能证明大月氏西迁首先占领的是当时属大夏的Sogdiana，也不能排除后来月氏势力撤出Sogdiana以及Sogdiana改属康居的可能性。至于所谓"六百九十里"，乃是《汉书·西域传》编者根据休循国"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推算出来的，由于同其它已知事实相悖，不足为据。④

十四

《汉书·西域传》载："康居有小五王：一曰苏䪏王，治苏䪏城，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护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阳关八千二十五里；三旦窳匿王，治窳匿城，去都护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阳关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护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阳关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奥鞬王，治

---

①桑原氏第20页注③所引文。

②内田氏第19页注⑤所引文。

③桑原氏注第20页注③、第35页注③所引文。

④见本文第三节。

奥鞬城，去都护六千九百六里，去阳关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属康居”。对此，需要说明的有以下几点。

1. 在《汉书·西域传》中，这一段关于康居五小王的记述和康居本传之间，隔着一段关于奄蔡的记述，这说明五小王治地不在康居本土，五小王不过是康居的附庸，即所谓“属康居”。如前所述，Sogdiana是康居的属土，因此这五王的治地很可能在Sogdiana。《汉书·西域传》的编者列有关五小王的记述于“奄蔡传”之后，显然是为了避免引起误解，可见这位编者是知道康居本土和属土的区别的。另外，这五小王虽系康居附庸，毕竟在康居势力范围之内，所以同传才称安息国“北与康居接”，同书“张骞传”也把张骞途径的Sogdiana地区称为“康居”。《后汉书·西域传》不见有关五小王的记述，是因为当时已知五小王治地主要在“粟弋”，遂以“粟弋国属康居”一句概括之。

2. 《史记·大宛列传》载“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扜罙、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或以为其中“苏薤”即“苏𩡵”，可见苏𩡵王治地应在宛东，确切地说应在大宛东北，五小王治地或均应求诸康居东部领土。① 今案：《汉书·西域传》载大宛王治“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而苏𩡵王治地东去都护“五千七百七十六里”，知该地应在宛西。《史记》的“苏薤”果系康居五王之一，则不能不认为有关其方位的记载不确，或因该国同姑师等宛东诸国同时朝汉而致误。②

3. 或以为“窳匿”与“越匿”音同，康居王冬所治应即窳匿王地。③ 今案：此说或是然康居王治卑阗城去窳匿王治窳匿城，若按去都护里程计，约三百里；而卑阗城至越匿地“马行七日”，果然其王冬治窳匿城，则“七日”似有误。又，“越匿”又作“乐越匿”，“越”或“乐”之音注，后混入正文，又被省作“越匿”。

4. 五小王治地去都护里数与去阳关里数之差依次为：2.249，2.258，2.259和1.449，知所载里数有误；若改苏𩡵城、附墨城和奥鞬城去都护里数为五七六六、五七六六和六〇九六里，更动不过三字，则都护与阳关里数之差已归一致（2,259），且去都护里数末位均为六而去阳关里数末位均为五，明去五小王治地里数测定所取基准点相同。④

十五

---

①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②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

③王国维第34页注④所引文。

④松田寿男第32页注②所引书PP、71～72校正《汉书·西域传》所载康居五小王里数如下：

	去乌垒里数	去阳关里数
窳匿城	5,266	7,525
附墨城	5,766	8,025
苏𩡵城	5,776	8,035
奥鞬城	6,096	8,355
罽　城	6,296	8,555

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略同，唯改苏𩡵去乌垒里数为5,766，去阳关里数不变。今案：两说皆可通。

《晋书·西戎传》:"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对于这则记载，历来有种种误解，在此试予辨析：

1．或以为"苏薤"即Soghd（Sogdiana）之音译，传文称康居王居苏薤城，说明康居王治其时已经南迁。①今案：康居果迁都Sogdiana，则不仅与传文关于"在大宛西北"的记载相悖，且和下文"与粟弋、伊列邻接"的记载牴牾；"粟弋"应即Sogdiana，说者以为指克里米亚半岛的Sughdag；②实误。

2．《史记·大宛列传》称"苏薤"为宛东小国，或以为"东"可指东北，知晋代康居王治已经东迁。③今案：《史记》所传"苏薤"果在宛东，康居王治既迁往该处，则传首不应再称"在大宛西北"。又，"地和暖"云云亦不是康居东部领土Talas，Chu河流域的风貌。④

3．或以为当时康国（Samarkand）已脱离康居独立，使臣自称其都城为"苏薤"（Soghd），因而错系於康居条下，可谓误出有因。⑤今案：此说似是而非。一则"苏薤"有王，并不表明苏薤已脱离康居而独立，《汉书·西域传》明载康居属地有五小王。二则，"苏薤"即Soghd，但未必是康国，因此与"康居"混淆似乎无从谈起。

因此，我认为"其王居苏薤城"至"出好马"凡三十一字，是关于粟弋的记载。试比较《后汉书·西域传》所载："粟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陶众果，其土水美，故蒲陶酒特有名焉。"可知Sogdiana的风情确实如此。"人貌衣服略同大宛"是因为两地居民同系亚利安种而且同为土著的缘故。故前引《晋书》之文其实是"康居传"和"粟弋传"混合而成：

> 康居国，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与粟弋、伊列邻接。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封事，并献善马。
>
> 〔粟弋国，属康居〕，其王居苏薤城，风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暖，饶桐柳蒲陶，多牛牛，出好马。

至於两传相混，固然是由於《晋书》编者所据资料有夺文和错简，但究其根本，或者晋时粟弋国依然属康居，故粟弋事情附见康居传后，或在康居传中附带提及；如此而已。⑥

十六

《隋书·西域传》载："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

①见内田吟风《匈奴西移考》，载《北亚史研究·匈奴篇》（昭50）。

②内田氏本页注①所引文。参见第35页注②所引拙著PP、44～45。

③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④参见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

⑤岑氏说（出处同注第33页注⑤）。

⑥《通典·边防九》："康居国……王理乐越匿地、卑阗城，亦居苏薤城。"不过是对《汉书》、《晋书》记载的机械综合，不足为据。

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论者多以为其中“康国”（Samarkand）因与“康居”首字相同，故《隋书》编者误以为一国；近人以为康居位于Sogdiana，则皆承袭《隋书》之误。传文既称康国为“康居之后”，又称其王“月氏人也”，亦自相矛盾，至于所述昭武姓之起源，皆系当时人臆测，全不可信。总之，这则记载由一系列的误解，杜撰构成，并无史料价值。① 然而我认为不然，今试作分析如下：

1．如前所述，包括Samarkand在内的Sogdiana地区至少自张骞西使起直至东汉末一直役属於康居；故传文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其实不误。从政治隶属关系来看，这种提法即使不十分确切，也无可厚非。近代学者误指康居属土Sogdiana为康居本土，不应由《隋书·西域传》编者负责，这位编者其实并没有说康居本土在Sogdiana。

2．Samarkand译为“康”国，是因为Sogdiana人称该地为r′n＝xan；②之所以用选“康”这个汉字，也可能是因为隋代人知道该处旧为康居属地；换言之，未必译为“康”国后再联想为“康居之后”。即使仅因r′n而误以为“康居之后”，仍不失为歪打正着。

3．《史记·大宛列传）载，大月氏西徙，“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很可能经过Samarkand，因为该地是自Farghāna赴Tuharestan的必由之途。因此，大月氏遗民该处，这些遗民后来称王Sanarkand，成为昭武姓之祖的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所谓“迁徙无常，不恒故地，应是最初的情况。故论其地，是“康居之后”；论其王，是月氏之裔。必须指出《新唐书·西域传》载贞观年间入贡的安国王诃陵迦，曾炫耀其王统之悠久，“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同时入贡的东安国也有“子孙相承十世”之说，两国均系康国王支庶，可见康国王统更为悠久，Samarkand的昭武姓起源甚古。但是，不能因此认为Samarkand的昭武姓称王该地最早可上溯至月氏为匈奴所逐“西踰葱岭”之时，“遂有其国”，不过笼统之言理解不可执着。也不能因此遽断《汉书·西域传》所载康居五小王均为 Samarkand 昭武姓之支庶。但从传文所谓“自汉以来相承不绝”来看，最迟在汉末已立国於Samarkand了。又，Samarkand的月氏遗民由小到大，自称王该地到分王各处，应有一个过程，只是因为资料保持沉默，连同他们和其南北邻大月氏、康居的关系都不得而知了。另外，康国等昭武姓国家中，王族是月氏人，臣民当系Sogdiana土著；来华的昭武姓中，自然也有冒用王姓的土著可能由于王族与土著人种相同或相近，汉土无法甄别。

4．《隋书·西域传》编者仿佛也想为康国左右诸国王系月氏人后裔提供证据，还进而指出其姓“昭武”可溯源于“祁连山北昭武城”。此说近人多斥为无稽之谈。③ 今案：月氏旧居，据《汉书·西域传》，在“敦煌、祁连间”。此处汉“敦煌”指今祁连山，汉“祁连指今天山；④ 而据同书“地理志”，昭武县属张掖郡，在今祁连山北，盖隋时已称今祁连山为

---

①例如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②W、B、Henning第34页注⑦所引文。白鸟氏第20页注③所引文以为“康〔国〕”乃〔Samar〕kand之略译，隋人又因其音与“康居”类似，遽断两者为一国帕今案：白鸟氏说不确。

③例如白鸟氏注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④参见第17页注④所引拙文。

祁连山。案之《晋书·地理志》，昭武县在西晋时避文帝记已易名“临泽。”由此可见，隋人不可能也无必要把这个久已湮灭无闻的古县名硬按到Sogdiana诸王头上。换言之，传文称康国等国国王为月氏人，均姓昭武，并溯源於“昭武城”必有依据，很可能得诸当时来华的昭武姓国人。

5、传文所谓“其王本姓温”，后改姓“昭武”之类记载，则反映了Sogdiana诸国一度沦为哌哒属国这一事实。对此，我已有论考，在此不赘。①

十七

《新唐书·西域传》有如下记载：“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即康居小君长罽王故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据此，则康居五小王中罽、窳匿、附墨、苏薤四王的治地分别在Bokhara，Tashkend，Kashania和Kesh，如前所述，诸地在汉代均属康居。至于传文所谓奥鞬王治地“火寻”（Khwarizm），应即《史记·大宛列传》所见宛西小国“驩潜”，位於阿姆河下游左岸，安息曾一度与之对峙。从地理位置来看，Sogdiana既属康居，驩潜也属康居的可能性不能排除。②《汉书·西域传》称安息“北与康居〔接〕”，如前所述，应指安息占有木鹿地区后，在阿姆河中游与康居属地Sogdiana相接；但似乎也可以认为这句话乃指安息在阿姆河下游与康居属地驩潜相接。③既然如此，《新唐书·西域传》有关记载总的说来是合理的。或以为这些记载全属无稽之谈，④似未深察。

但是，必须指出，《新唐书·西域传》求汉代康居五小王治地于康居属土是正确的，只是具体比定不可全信。按之《汉书·西域传》原文，在五小王中奥鞬王治地去都护治所最远为“六千九百六里”，置奥鞬城於Khwarizm似无不合，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一里数其实是错误的，应为“六千九十六里”，可知奥鞬王治地较罽王治地去都护治所为近，罽王治地果在Bukhara，则奥鞬王治地显然不该在Khwarizm。《新唐书·西域传》作出这一比定说明《汉书·西域传》有关康居五小王去都护治所里数的刊误由来已久，唐宋人所见与今本相同，也说明《新唐书·西域传》编者并没有发觉《汉书》的刊误。由此可见，上述对奥鞬

---

①参见第35页注②所引拙著PP、44～65。

②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以为：《史记·大宛列传》并举驩潜、康居，可知前者不属后者。今案：其说未安，参见第35页注②所引拙著PP、129～142。

③白鸟氏第31页注①所引文以为安息国“临妫水”一句表明Khwarizmia在安息版图之内；似未安，参见孙毓棠第34页注⑦所引文。

④例如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内田氏第18页注③所引文。又，岑仲勉（出处同第33页注⑤）主张应求五小王治地于康居属地Sogdiana；甚是。但岑氏指苏薤为Samarkand，附墨为Bukhara，窳匿为Chinaz，罽为Kāth，奥鞬为Khwarizmia；则未安。盖自都护西至Samarkand和Bukhara两地里距不应相等，自Samarkand去Kāth和Khwarizmia亦不止300～500里Chinaz这一地名也无法落实。又，E、G、Pulleyblank第29页注④所引文亦指罽为Kāth。

王治地的比定并不是根据唐人的实际调查材料，而仅仅是根据误刊的里数作出的。

当然，我们不能由於奥鞬王治方位的比定是错误的，也就否定其它诸王治地的具体比定，因为很难找到这位编者一概作伪的动机。而如所周知，唐代与西域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过前代，唐人完全有可能确知五小王中某几个王故地的所在，并留下了记录。《新唐书·西域传》的编者则凭借《汉书·西域传》的里数记载作了补充，以求全面。事实上，《新唐书·西域传》关于其余四小王治地的比定还是可接受的。

1．按之去都护治所的里数，将康居四小王治地由东而西排列，则次序应为窳匿、苏䪥和附墨、罽；因此，依次比定为石、史和何、安四国，似无不合。其中，苏䪥和附墨去都护里数经校正后同为五千七百六十六里，若以Samarkand为基准点，则都护去两地可以认为是等距的。

2．“窳匿〔jio-niət〕可视作“赭时”〔tjyazjiə〕的异译。“苏䪥”或为Soghd之音译，“史国”之地在汉代可能是Sogdiana的中心，故有此称。① “安国”，据《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又称忸密斯羯（Numijkath）。”“罽”或者即kath之音译，kath义为“城”。②指“附墨”为何国，对音虽无着落，但不妨认为该地另有一个“附墨”音近的称呼。

3．至于“奥鞬”〔uk-gian〕一地，我认为很可能是“东安国”（Kharghōnkath）《新唐书·西域传》载：“东安，或曰〔小〕安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治喝汗城亦曰䫻斤”。“奥鞬”或即“喝汗”、“䫻斤”之异译。《隋书·西域传》载何国“西去小安国三百里”，而《汉书·西域传》载附墨与奥鞬间相去三百三十里，亦大致相附。

十八

本节略述康居与两汉魏晋以及其周邻诸国的关系。

1．康居，首见于《史记》；早在张骞西使复命之前，已为汉人所知。《汉书·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军兴发诛其渠率，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遣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康居西域，重译纳贡，稽首来享。”《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略同。又，《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对策之言曰：“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相如喻告巴蜀民在元光中（前133/132年），③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前134年）；而张骞西

---

①J、Markwart，Ērānsahr，Berlin，1901，PP、302—314；E、Chavannes，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s）Occidentaux，St、Petersbourg，1903，P、146，Note 3；E、D、PulLeyblank第29页注④所引文所说略同

②“罽”最初应为Kath之音译，汉人误以为专称，遂有“罽城”一名。参见岑氏说（出处同第33页注⑤）。

③《汉书·西南夷传》载，武帝“拜蒙以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余人，从巴符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又同书“司马相如传”於相如檄后载：“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载，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亿万计。”今案：同书“地理志”：犍为郡“建元六年开”，知相如於唐蒙治道二岁后使蜀，时在元光二至三年间。

使月氏于元朔元年（前126年）才归朝复命，①知前此汉人已知西方有康居国。又，相如、仲舒所指应为同一事，康居曾於建元年间致使汉庭，当无疑义。视为文人涔饰之辞，②似欠安。

2．据《史记·大宛列传》可以考知，张骞首次西使，曾途经康居属地Sogdiana。而同传所载，张骞使乌孙时（元鼎二年，前115年），曾分遣副使使康居则为见诸记载的汉庭首次致使康居。可以说，康居是最早与汉朝交通的西域国家之一。

3．尽管康居早已同汉廷建立关系，但终两汉之世，康居几乎一直是经营西域的阻力。

武帝时，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等记载，李广利征大宛时，康居曾遣兵救宛，仅因汉兵势盛，才未敢进军。李广利遣上官桀攻破大宛东边属邑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汉兵破宛，康居始出郁成王予桀。

宣帝时，据《汉书·匈奴传》等记载，匈奴“郅支单于既杀汉使者，自知负汉，又闻呼韩邪益强，恐见袭击，欲远去。”康居王“遣贵人，橐它驴马数十匹，迎郅支”，置诸东边同书“陈汤传”载，陈汤征郅支，围困郅支於都赖水上郅支城，康居又遣“兵万余，分为十余处，四面环城，”与郅支相呼应。汉兵破城，始“引兵却。”

成帝时，据《汉书·西域传》，乌孙“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日贰亡，阻康居。”又载：小昆弥“末振弟卑爰疐本共谋杀大昆弥，将众八万余口北附康居，谋欲借兵兼并两昆弥。”

东汉章帝时，据《后汉书·班超传》载，康居虽一度助超攻姑墨，但当超攻疏勒王忠时康居又“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锦帛遗月氏王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

诸如此类，可见康居往往站在汉朝的对立面，招降纳叛，成为反汉势力的后盾。

4．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汉书·陈汤传》、《后汉书·西域传》等，可知康居虽曾一度役属于月氏，但后来势力强盛，不仅役使粟弋、奄蔡、嚴国，还不断侵暴大宛、乌孙等国。因此，对于西域本身，康居也不是一个稳定因素。

5．《汉书·西域传》载：“成帝时，康居遣子侍汉，贡献，然自以绝远，独骄嫚，不肯与诸国相望。都护郭舜数上言：本匈奴盛时，非以兼有乌孙、康居故也；及其称臣妾，非以失二国也。汉虽皆受其质子，然三国内相输遗，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见便则发；合不能相亲信，离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结配乌孙竟未有益，反为中国生事。然乌孙既结在前，今与匈奴俱称臣，义不可拒。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啗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诗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匈奴百蛮大国，今事汉甚备，闻康居之拜，且使单于有自下之意，

①董仲舒作天人三策的年代，史学界众说纷纭，然可大别为建元年间说和元光年间说两类。此据施丁《董仲舒“天人三策”作于元光元年辨》，“社会科学辑刊”3，1980。又，苏鉴诚《董仲勉对策在元朔五年议》，“中国史研究”，1984，Ⅲ，认为在元朔五年；然其说似难成立，见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1986，。Ⅲ

②见王先谦《汉书补注》。

宜归其侍子，绝勿复使，以章汉家不通无礼之国。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空罢耗所过，送迎骄黠绝远之国，非至计也。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据此，可知康居对汉廷采取敌对态度是由于“自恃绝远”，汉庭的对策是所谓“羁縻而未绝”。也可知汉庭在对康居的策略上曾有过一番争议。之所以终于接受康居的侍子，不惜“罢耗，”一直羁縻这个“骄黠绝远之国”，可能有二个原因：一是为了宣扬国威，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即所谓“重致远人”。《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首次西使归国，武帝“既闻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可知对康居的方针作为对西域总方针的一个组成部份，早在武帝时就确定下来了。二是开展西域经营的实际需要。盖康居是西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背向对西域形势的稳定有直接、间接的影响。据《汉书·西域传》，康居不属都护，但都护的职责之一便是督察康居等国的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康居因“绝远”，不可击，於是只能“安辑之。”故一面督察，一面通过使节往返，赂遗设利，尽可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至于康居，虽然一直骄嫚不逊，却也屡屡贡献，甚至遣子入侍。其原因，都护郭舜指出乃是为了“贾市”。如前所述，这很可能是其属下 Sogdiana 人所教唆，但康居作为一个游牧部族，迫切需要各种农产品也是重要因素。可以说，通过贡献遣子入侍以求“贾市”，和不断侵暴、役使周邻诸国，与汉为敌，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除了满足康居统治者的奢欲外，都是为了补充游牧这种自然经济先天的不足。

6．魏晋以降，中国史籍中有关康居的记载为数寥寥，仅《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提到康居曾经朝魏；《晋书·武帝纪》和同书《西戎传》分别提到康居曾在太康八年(280年）和泰始（265～274年）中遣使朝晋；同书“苻坚载记”亦载康居曾遣使贡方物於前秦。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中原多事，与西域的联系远不如两汉密切，对康居的活动知之不多。但也可能是康居的势力不如以前强大。从《魏略·西戎传》可知奄蔡已不属康居，而至迟到公元四世纪七十年代初，Sogdiana也脱离康居，归属哌哒，势力范围既远不如昔，其影响自然也就随之减少了。

十九

据《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等记载，东汉末至东晋，有不少“康”姓僧侣在华译经，著名的有康巨、康孟详、康僧铠、康僧会，康僧渊、康法邃、康道和等。据传，这些僧侣学通三藏，均有慧学之誉。其中，康孟详，《开元释教录》明载“其先康居国人”；同书和《高僧传》也载康僧会之先是“康居”人。按照当时西域人来华后采用汉姓的惯例，诸僧似乎都应该是康居人。然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指出康居人以游牧为生，未必有如此发达的文化，故来人很可能是Sogdiana人。①果真如此，我认为似乎可进一步断定

---

①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岑氏（出处同第33页注⑤）说同。又，白鸟氏以为，康姓僧侣来华最早见於梁慧皎纂《高僧传》，而南北朝以降主隋代，中国人以康国为康居，故诸僧姓“康”和“康国”这一译名有关。今案：其说未安。“康国”始见《隋书》，此前不见载籍，白鸟氏所举《魏书·西域传》和《北史·西域传》不足为凭，两书有关“康国”的记载乃间接或直接转录自《隋书·西域传》；南北朝人称Samarkand为“悉万斤”，没有译作“康国”。

上述诸僧应为Samarkand人。盖按之《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大唐内典录》，诸僧来华译经时间，康巨、康孟详分别在东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和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康僧铠和康僧会分别在曹魏齐王芳嘉平四年（252年）和孙吴赤乌十年（247年）；康僧渊、康法邃和康道和分别在东晋成帝世（326～342年）和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但其人或其先离开故土的时间不可详考。其中如康僧会，《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均载其先“世居天竺”，故《大唐内典录》逕称之为“中天竺沙门。”其他如康巨、康孟详、康僧铠等的先人,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大唐内典录》均称之为“天竺国沙门”或“中天竺国沙门”来看,很可能其先人早已移居天竺。由此可见,这些“康”姓僧侣在华译经的年代虽然最早为东汉灵帝世，但其先人却可能早在西汉时已离开故土。西汉时，Sogdiana系康居属土，故汉人称之为“康居”,但在这时离开故土的Sogdaina人似乎不太可能自称“康居”人,尤其是侨居天竺以后再来华者，更无必要有自承康居臣民。东汉时，Sogaiana仍属康居，但是其时汉人已知该地名称：“粟弋”，故此时来华的Sogdiana人被称“康居”人的可能性应该更小。而迟至四世纪七十年代，Sogdiana，已属哌哒，此后来华的Sogdiana人自然不可能再自称或被称为“康居”人了。因此，诸僧侣果然是Sogdiana人的话，则应来自Samarkand，该地被Sogdiana人称为r′n＝xan，汉人误以为“康居”之“康’，遂冠以“康”姓，并称之为“康居”人。

必须指出的是康居人尽管游牧为生,少数人信奉佛教,并成为学者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后世游牧部族如柔然，信佛者颇众，《魏书·蠕蠕传》载，魏永平四年（511年），柔然可汗“丑奴遣沙门洪宣奉献珠像。”又,《高僧传·释法瑗传》载法瑗的二兄法爱“亦为沙门,解经论兼数术,为芮芮国师,俸以三千户“。《宋书·索虏传》则载柔然人始则“不识文字,刻木以记事”，其后“渐知书契”，终于亦“颇有学者”；可以参证。康居以Sogdiana为属土，其人受该地相对发达的文化影响，部分人渐渐脱离粗犷之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因此，上述来华的康姓僧侣究竟是康居人还是Sogdiana人颇难判分。

二十

最后，讨论一下康居的族名、族属和源流。

1．“康居”〔Kang-Kia〕可能是Sacarauli（Sacaraucae）的略许，或者逕是Sakā（Sacae）的对译，盖（kang→）ki腭化为si（→sa）；果然，康居人应该是留在锡尔河北岸的塞人，或者以Sacarauli人为主。①可能是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

①W、W、Tarn第19页注①所引书PP、291—262以为Sacarauli（Saraucae）正确的写法应为Sacaraucae（Saka Rawaka）,亦即见诸大流士一世Nags-e Rostam铭文的Sakā Haumavargā和Sakā Tigraxaudā。今案：其说或是。然而他进而认为Sacaraucae应在锡尔河之南,即Ptolemy所载Sagaraucae（VI，4）；则非是。一则,Naqš-e Rostam所载两种Saka应在锡尔河北；二则,Ptolemy所载Sagaraucae果在河南,则应是后来迁自河北。又,E、G、Pulleblank,Chinese and Indo Europeans,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66以为“康居”的语源是吐火罗语Kaṅ意为“石”。录以备考。

用，康居人长期保持着游牧的生活方式，而进入Farghāna和Bactria等地的塞人都迅速走向定居、农耕；因此，《史记·大宛列传》称康居兵强、大宛和大夏兵弱畏战。

2．据Trogus Prologues(XLI)记载，占领Sogdiana的也有Saraucae(Sacaraucae)人①，这些Sacaraucae人和其它进入Sogdiana的塞人后来都应该役属于锡尔河北的康居。至于《汉书·西域传》所载受康居役使的五小王和这些进入Sogdiana的塞人关系如何，则无从知道。

3．据《史记·大宛列传》，"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贾市，争分铢。"又据同传"康居在大宛西北"，知康居人的族属和语言系属应和大宛、安息相同或相近。②或以为康居应为突厥语族，因为《汉书·匈奴传载康居有"翎候"号，"翎候"即后世突厥的"叶护"，《晋书·西戎传》又载康居有王名"那鼻，""鼻"即突厥语bi，bak。③今案：此说未安。"翎候"、"鼻"等未必突厥语族所固有。又，《世说新语·排调篇》载康僧渊的状貌为"目深而鼻高。"如前所述，不能排除康姓僧侣是康居人的可能性，因此，康僧渊的状貌可作为康居人是亚利安种的佐证。

4．或以为北魏的高车，唐代的康曷利、元代的康里等皆系康居之流，而突厥《阙特勤碑》所见Kängäräs，拜占庭康斯坦丁七世（Constantinus VⅡ，911～959年）所纂《帝国行政论》（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一书中提到的pečneeg族之一种kaggar等也是康居的后裔。④今案：这些看法，就探讨康居的源流而言，均能给人以启迪，不无积极意义。然而，不能由于高车或Kaggar等可断为突厥语族，也断康居为突厥语族。一则，囿于资料，对南北朝以降康居人的分合、迁徙，今天已很难作出具体的说明了。⑤换言之，不能仅凭名称发音的相同或相近，便断Kaggar等和康居同族。二则，即使能发现高车等确与康居之间有着某种渊源，恐怕也至多认为康居是高车等的族源之一，不能认为高车等和康居的血统和语言完全相同。

（责任编辑：阿·苏尔曼）

---

①见A、K、Narain,The、Indo、Greeks,Oxford,1957,P、129；以及第17页注④所引拙文。

②参见第17页注④所引拙文。

③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

④J.Markwart,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hen,Leipzig，1898，PP、9—10； W、Barthold,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und die arabischen Quellen（W Rodloff，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niften der Mongolei,Zweite Folge,St、petersbourg,1899,PP、12—14）；白鸟氏第32页注⑤所引文；松田氏第32页注②所引书PP、328—329等。

⑤岑仲勉（出处同第33页注⑥）以为康居於公元三世纪东迁，是为元魏之高车，后复西徙，是为康曷利、康里。